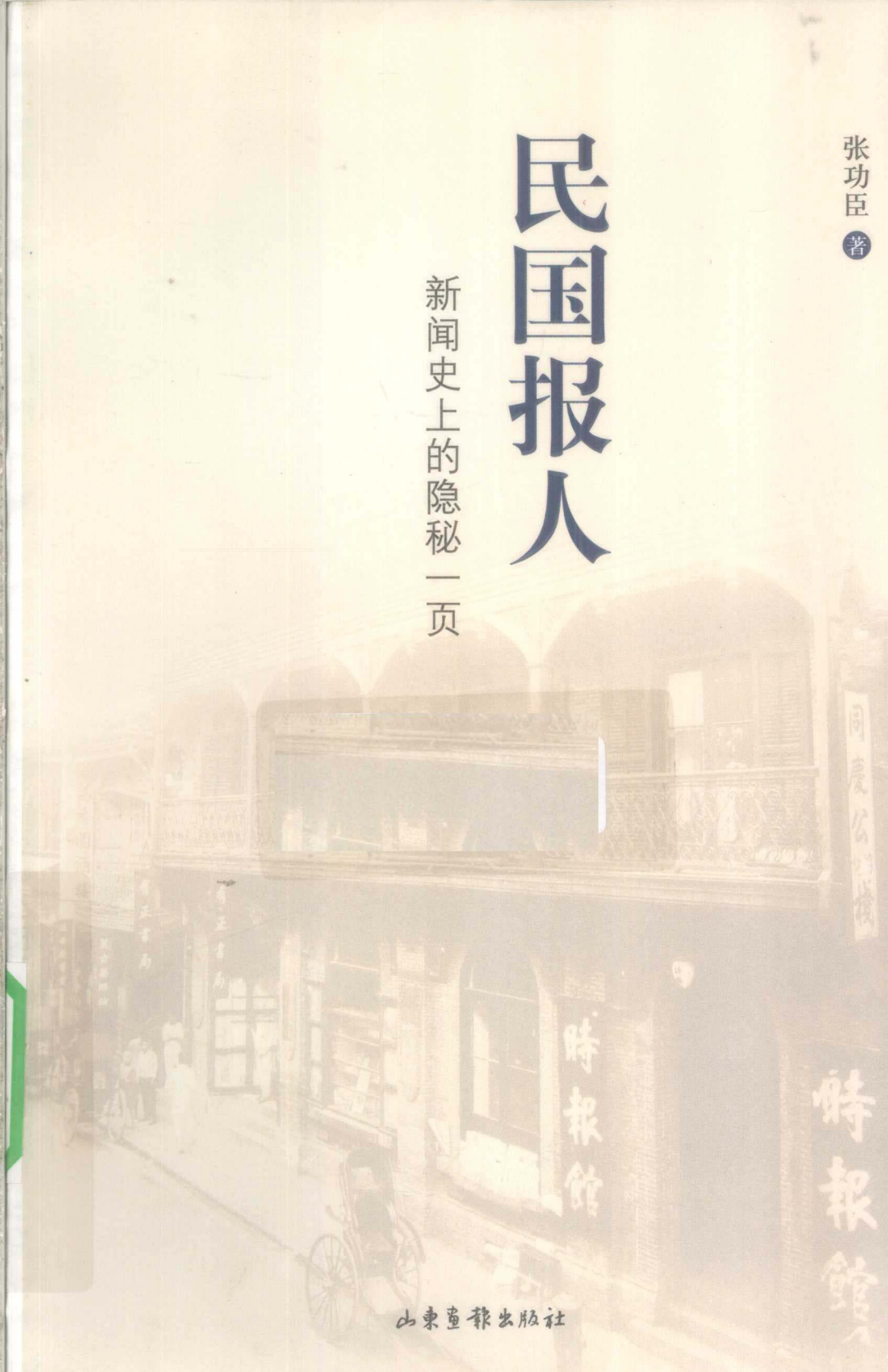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功臣 著

民国报人

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张功臣
著

民国报人

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

山東
畫報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民国报人：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 / 张功臣著. — 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10.9

ISBN 978 - 7 - 5474 - 0107 - 1

I. ①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报纸—新闻事业史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G219.2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058340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 王宝磊

装帧设计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

规 格 150×228 毫米

13 印张 26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
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序：新闻史原来是这样

大约在四十五岁上下，我对于读书的兴趣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：开始排斥虚构文学，渐渐地拒绝一切艺术加工文字，能够阅读的东西，既要有历史的意味，还必须是真人真事，才有耐心读下去。这样一来，凡得入目者就只有历史记事、回忆录、传记之类了。可是想当年，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，不仅如痴如醉地写过诗歌，作过小说，能够一口气说出几十位欧美名作家的名字及代表作，背诵国内古今诗人许多名篇，而且立志要写出像格雷厄姆·格林《一支出卖的枪》那样洞察人性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《恶时辰》那样圆熟完美的文学作品。詎料山河依旧，时光如电，事情却到了这种境地——我已经欣赏起李敖酷评胡适、蒋介石，研究起高阳考据历史人物的功夫，阅读跨度如此之大，连自己都吓了一跳。这是一种什么心态？这属于哪门子审美情趣？我悟不出，去问同龄的朋友，告知以这是老之将至的前奏，也是一个人渐臻成熟的表现，实属正常情况。但我从这话里品出了一种怜悯和悲哀，不是对别人，而是对自己。孔子有云，“四十不惑”。我竟愚钝如此，年近五十，才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前人的思想行止，到书本里追索什么历史真相，可见智力发育缓慢，此外，对优美典雅且有韵味之文学失却品尝能力，说明单调乏味之生活或将从此开始。这虽然称不上人类的不幸，对一个仍在汗流浹背追赶时代的人来说，也算是一件足可沮丧的事了。

话说回来,《民国报人》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颠倒、忐忑不安的心境中慢慢写出来的。在告别文学的过程中,我陆续读了一些“真实”的书,其中以民国人物的自传、回忆录居多,民国人物中,又特别注意报人的故事及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。为什么会这样?这就涉及我对于新闻史的一种情结。我在大学毕业后做了十余年记者,后来又某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研究生,至今从事的仍是与新闻有关的工作,按说对于所谓新闻学,也算是个“科班”,但倘若问我在近百年来我国新闻事业演进发展过程中,发生了哪些大事、产生过那些著名人物,我基本上答不出,但我知道,中国的新闻历史绝非我们以前在高校书本中学到,并且现在仍在培育一批批新闻从业者的高头讲章里所说的那种模样,特别是读了一些报人的自述文字,加以核对一系列原始记载,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。多年以来,我们的新闻史学者在编撰史章时,都自觉不自觉地要“以史为鉴”,岂知一动此念,功利之心亦尾随而至,历史的本来面目遂消隐无迹。如此一来,他们手创的新闻史书对于民国新闻史这一段,有意无意遮蔽湮没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与人物,坊间层出不穷的有关读本、教材亦因循其例,沿袭其说,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,情况一直没有多少改变。如果在以前若干年,还可以拿政治环境、话语禁忌等作为不求改变的借口,那么身处我们这个已日渐多元化的时代仍举步不前,则只能表明新闻学人的懒惰与浑噩了。

拿我自己对照来看,我并非勤奋清醒之人,不担任传经论道职责,更没有改造新闻史的决心,我只是想把新闻史上隐秘的一页页,翻看给读者看而已,所谓“以史为鉴”,完全是读者的事。因此在本书写作过程中,零打碎敲,飘忽不定,对于所写人物的选择,完全凭兴致所至及资料多寡,在有限的阅读基础上,排比材料,综合观点,一五一十叙述出来。这样,过去仅在某书中看到的一个名字,或在某文章中读到的一件史事,经过背景材料的叠加和同时代人的佐证,就成为一篇较为完整的人物往事,这对现有新闻史来说,或是一种必要的补充。虽然各篇成文每多周折,但总体

上这是一件有趣的事，以本书首篇《大江曲》为例，何海鸣这个人在各种版本的中国新闻史中均鲜见记载，或偶有涉及，亦仅见其名，这种情形固然为写作增添动力，但搜集材料又成了难事，及至抓耳挠腮，穷究不舍，而终于柳暗花明，连缀成篇，为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办报活动增加一鲜活的注脚，此中乐趣则妙不可言也。再譬如成舍我的报人生涯，史料存有不少片段回忆，然而东鳞西爪，读后很难形成完整印象，我乃从他个人的口述入手，结合同时代人的笔证加以对照，勾勒出来的这位硬骨头报人，就比官定新闻史上可信得多。其他如陈德徵、金雄白、陈彬龢诸人，因历史上的劣迹，正史一向隐讳其事，甚至不载其名，其实他们在当时各大报刊均担任过显职，见证过许多大事件并深谙其中内幕，追踪他们的过去，实际上也是对新闻史的一种深度开掘。本书其他各篇，人物、事件有交叉亦有跨越，从总体立意上来讲，我没有写大历史的宏愿，我只是记述了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，一些报人的个人经历而已。如果历史是人创造的，那么新闻史本来也是由一个个报人创造的。

通读全书，读者还会发现，如果按照我们已经习惯的“党派站队”套路，书中的大部分人物很难归类，党派意识形态相信非黑即白，但这些人要么“偏黑”，要么不黑不白，要么灰蒙蒙一团，没有几个能够见容于现行新闻史，可称之为“白”的。其实，当我把各稿汇编到一起后，一眼览尽，也曾大呼悲哉惨也，难道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民国报人么？当然不是。如果用画像来比喻，民国报人应是一幅灰白黑各色俱全的群像，但本书并不准备担负这一神圣使命，只是画几帧色泽灰暗的素描而已。那些专载“洁白无瑕”角色的新闻史版本，已充斥书店架上和大学课堂，无须吾人忝列其后，徒增纷乱，倒是添加几抹暗淡沉积的颜色，或可让我们的新闻史的色调，更接近历史的本真。这样的结果，民国报人留给我们的，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，历史研究和阅读所获得的，才是一种宽阔的视野。另外，书中人物的命运，统而观之，竟然大半是“悲剧”，同样这也非我

有意为之，而是不少风云人物在那个时代特有的归宿，这些个人的悲剧，我们宁可看作是时代的悲剧。在记述前辈们旧事的过程中，特别当他们在许多历史关头作出的选择时，我有时为之肃然，有时为之同情，更多的是感到无言的悲哀，我尽量回避这些复杂的情绪，不使明显流露在字里行间，影响记人叙事的客观公正，但不知道是否做到。再者，在使用材料方面，我努力寻找原始文件和第一手资料，让它们出来说话，而避免我自己的议论，引起对读者的误导。因为历史原来就是这样，新闻史原来也是这样。我想，这是一个试图正确叙述往事的人，对历史应该持有的谦卑态度。

张功臣

二〇一〇年正月于京北西三旗

目 录

序：新闻史原来是这样 / 1

大江曲

——辛亥革命中的何海鸣 / 1

往事半苍茫

——成舍我的办报生涯 / 45

历史转弯的地方

——时报馆里的金雄白 / 102

请作布雷鸣

——报人时代的陈布雷 / 156

只是当时已惘然

——《民国日报》总主笔陈德微沦落史 / 178

穿过了变幻风云

——《大公报》客卿陈纪滢 / 215

一半是斗士，一半是汉奸

——陈彬龢在《申报》 / 271

辣手著文章

——《申报》总主笔列传 / 301

“孤岛”血痕记

——上海报人抗战往事 / 363

大江曲

——辛亥革命中的何海鸣

民国报史的第一页，赫然书写着“革命”二字，它出自湖北报人的手笔。辛亥年间，革命党人通过办报纸、写文章，散播革命思想，策动反清起义。“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起来的”，并非虚言。鄂省民报中，汉口《大江报》一纸风行，最有影响力。究其缘由，皆因“大江报案”。该报编辑詹大悲、何海鸣被捕入狱，埋下了湖北新军发难之根；武昌首义中，他们主持汉口军政分府，与武昌都督府隔江呼应，组织士兵坚守街市，与清军浴血奋战，一时名扬武汉三镇。其间何海鸣陪伴黎元洪一天一夜，最终说服他出任军政府都督，一段历史格局由此形成。

辛亥革命后，由于政见不同，詹、何遭到黎元洪排斥，成了边缘人物，其后命运坎坷，亦悲亦幻，何海鸣的经历尤为错综复杂。在有关史料中，记述詹大悲办报生涯、革命事迹较为详尽，然出于种种原因，对何海鸣这一重要人物或避而不记，或只言片语，实在是历史真实的一种遗憾。

“大江流日夜，鼓吹功不朽。”这是湖北报人胡石庵对《大江报》的赞誉。何海鸣是怎样一个人？他如何走上办报的路，又怎样成了一个革命党人？说起来是一段曲折的故事。

湖北新军中的一个秀才

何海鸣是湖南衡阳县北乡合江套人，生于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根据乡人记载，他少年时代在衡州官立小学堂读书，可见家境还不坏；他有

个姑丈住在衡阳城里，藏书甚多，每逢新年中，何海鸣总要到姑丈家住上四五天，“因为他家里小说很多，我一肚子的旧小说，都是在他家看来的”。少年何海鸣，是个有趣的乡间伢子，还是孩子王。及中年，何海鸣回忆儿时家乡过年情景：大年初一，同村孩子结伴到邻村同族人家，拜年讨压岁钱时，总是推选他挑头阵，“未出发以先，并订好路线，由那家到那家，再绕到什么地方才回来，都有一定计划”。每到一家，他一面“磕头作揖、连称恭喜”，一面“唯恐怕跳出一条恶狗来，将我的竹布长罩衫咬破”，带头进得门来，“往那桌边一坐，端起酒杯来”的样子，能看出他很有主见。¹

在学校里，何海鸣是个不安分的学生。他就读的衡州官立小学堂，管理伙食人员克扣学生膳食费，供给粗劣饭菜，几成惯例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，他却不能忍受，带头捣毁了食堂碗碟及桌凳，最后被校方开除了学籍。²可见他的叛逆精神，在这时已经萌芽。

当时何海鸣的父亲在湖北做官，于是接他到省城，“随宦武昌”，入两湖书院就学。这所书院，在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四月，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，专取湖北、湖南士子入学，条件是“才识出群、志行不苟”，每省员额两百名，经费主要出自当地茶商捐助。张之洞此举，本想为清王朝网罗人才，结果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，“戊戌六君子”中的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，自立军领导人唐才常，同盟会领袖黄兴等，皆为两湖书院学生。何海鸣的入学，要比黄兴晚了七八年。在两湖书院，他纵览五经四史及诸子书，看了不少小说传奇，后来办报纸做主笔，纵论时事，下笔千言，就是这时打下的基础。十五岁这年，父母先后去世，他的学历就此中缀。³

1. 何海鸣：《我家之新年·儿时新年中之快乐》，载《半月》第2卷11期，大东书局1923年出版。

2. 颜卓甫：《何海鸣》，载《湖南文史资料》1988年第5期，第25页。

3. 何海鸣自述：“予十五岁骤失怙恃，流徙在外，遂致失学。”见《求幸福斋随笔》，第20页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7年。

到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张之洞为了加强其创建的湖北新军，用重金聘请日、德军官，训练将弁，同时大量征募兵员，充实湖北新式陆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（旅）。何海鸣投了第二十一混成协，在第四十一标（团）一营当兵。说来凑巧，这支部队的主官（协统），便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，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。何海鸣的这段军旅生涯，对他一生影响很大，在1913年二次革命中，他一个文弱书生，敢于投笔从戎，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名义，据守南京，与北洋军苦战二十余天，也是仗着自己“粗知兵”这一点。¹

荆楚地方居于华中，天堑长江，绾毂南北，地灵人杰，素有革命传统。早年孙中山在国外组织兴中会，参加革命组织的“什九是湖北人”；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，“先后在乙巳、丙午两年参加的湖北同志，姓名列在本部名册之上的共有一百零六人”。²这些革命分子回到湖北，发展志同道合的友朋，秘密开会结社，组织了军队同盟会、将校研究团、益智社等众多小团体，又渐渐地聚零为整，成为发动武昌起义的基本力量。新军广募新兵时，革命党人把这看作打入清军的机遇，“都认定要想革命，必须运动军队；要想运动军队，非亲身投入行伍不可。”³一时间，武昌秀士入伍者甚多，科学补习所发起人张难先、胡瑛，日知会首领刘敬庵，同盟会员刘复基等等，先后弃文从武，以军营作为掩护，从事反清排满宣传。其中，大部分人都集中到了第四十一标，这一标的标统（团长）吴元泽是候补道出身，素有国民主义理想，特别欢迎文人学子前来投军，曾令飭全标各营队官长，对于有学识的读书有志之士，应一律好好优待。如此一来，新文人们呼朋引类，来得更多。何海鸣入伍正是时候，他在两湖书院受业

1. 何海鸣自称：“予服军役一年余，亦粗知兵；因读阐扬社会主义之书，遂弃兵籍……遂终以军人自居。”见《求幸福斋随笔》，第17页。

2. 黎东方：《细说民国创立》之四九《武昌起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。

3. 蔡寄鸥：《鄂州血史》，第14页，龙门联合书局，1958年。

的经历，得到了军中革命党人的青睐。他回忆说：

第一营左队中四个具有革命的志士，私自组织了一个群治学社，想在本军中吸引同志，扩大这团体组织，做革命的秘密运动。……各营队的同志，加入的便越来越多。我那时恰在一营前队当伍长兼司书室帮写，与左队不过楼上下之分（左队在楼上，前队在楼下），便也与第三营几位湖南同乡唐牺支一班人，全加入了这个团体。¹

新军里文人云集，队官多半通理文墨，何海鸣能写文章，又善谈吐，很快受到重用，不到一年工夫，由列兵升至营前队伍长，兼司书帮写。他与军中反清社团发生联系，受到革命思想洗礼，是从给报纸投稿开始的。武汉三镇，因粤汉铁路的修筑，这时已成为华中重要商埠，不仅在洋务、新政等方面领先风气，逐渐兴起的报刊事业，也居于全国先进之列。1905年至1911年，在湖北创办的民间报馆达五十四家，1908年清廷立宪后，就有十七种民办报纸问世；其中不少报纸，以鼓吹资本主义，宣传反清革命为主旨。²何海鸣投寄的稿件，立论大胆，文笔出色，汉口各报常常采用，但也受到长官的格外“注意”。不久，新任标统易甲鹏在报上看见何海鸣的一篇文章，认为用语叛逆，且有在军中谋变之嫌，对何大加训斥，威胁还要定罪杀头。³何海鸣自述：

1. 求幸福斋主（何海鸣）：《武汉首义的由来》，原载《越风》杂志第20期，1936年10月10日出版；转引自《辛亥革命史料选辑》续编，第148—149页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。

2. 刘望龄：《黑血·金鼓——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》，第3页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。

3. 见郭世佑：《何海鸣》，载《清代人物传稿》（下编第十卷），第238页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。

……我因为在军中还爱出风头，常向汉口各报投稿，更被他（易甲鹄）缜密注意，曾叫了我去当面警戒了一番。我看看情形不对，就索性请求退伍，到汉口实行办报去了。在汉口商务报社中遇着了刘尧澄（即刘复基），他是宋渔父（即宋教仁）的门弟子，到过日本，的确是同盟会的直系分子。又遇了蒋翊武，他也是湘西人，由同盟会派来武汉工作的。便同他两位继续投军，入了四十一标，越发积极地继续那群治学社的活动。¹

这是1908年上半年的事。就在这年8月，清廷颁布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以附则形式规定，臣民在法律范围内，享有言论、著作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等权利和自由，虽然是“伪立宪”，但地方官府对于一向严禁的结社、办报等活动，松动了许多。年底，光绪皇帝、慈禧太后先后离世，朝廷一片混乱，这让湖北的革命党人找到了可乘之机，纷纷聚集武汉，联络更加频繁。何海鸣所说退伍后办报等事，就发生在此时。²几经斡旋，他又回到新军，伍长是不能当了，改做士兵补习学校国文教员、军操教练，往来于武昌、汉口之间，成了反清秘密组织中的活跃分子。

加入汉口革命党人圈子

转眼间到了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秋天，由商人罗某出面集资，何海

1. 求幸福斋主（何海鸣）：《武汉首义的由来》，载《越风》半月刊1936年国庆专号。

2. 时任《汉口中西报》主笔胡石庵回忆：“（何海鸣）因事出营、其管带戴寿山怒欲杀之。（詹）大悲函予求救，余即亲赴戴处力保之出，为荐中西报作论说，因此得入报界，随就商务报编辑事。”见胡石庵：《湖北革命实记录》，载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第四辑、第223—224页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。

鸣和湖南乡党刘蛰庵参与社事，创办了汉口《商务报》，馆设汉口英租界致祥里8号，日出一小张，佯称“沟通商务”，实则灌输革命思潮。这是何海鸣投身新闻事业之始。他记述当时经历：

我第一次进的报馆，是汉口《商务报》，起初尚不过是发起人之一，后来因停顿了一些时而二次复刊，我更成为半个主体（另一半是詹大悲兄），这报上的论说和时评，便由我和詹大悲轮流包办。有时想多找一点零用钱，便还替汉口别家报馆也写上几篇，每一篇好卖那时候官钱局票一张，票面是当十铜元一百枚，合大洋约八角多，那便是我开始卖文的老行市。¹

不久，因罗某病故，资金中断，出版陷于停顿，为保全这张报，黄梅革命党人宛思演变卖田产百数十亩，以所得六百元出顶续办，自任经理，邀请詹大悲、何海鸣主持笔政。詹大悲是湖北蕲春人，与何海鸣同龄，在黄州府中学读书期间，因思想激进，得罪学监而被开除学籍，加入秀才宛思演创办的“证人学会”，立志改革社会，又随宛氏来到汉口，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。汉口《商务报》的骨干，如会计兼发行刘复基，撰述梅宝玢、查光佛、杨王鹏、李抱良，都是坚定的反清志士，除了梅宝玢（共进会员），其余均在新军第四十一标服役，与何海鸣素有交情，志同道合，感情甚为融洽。很快，该报成为新军秘密组织群治学社的喉舌兼联络机关，“凡联络党人，秘密集会及储藏炸弹手枪，皆在此”。²

湖北最早的革命组织是日知会，1906年被官府破获后，武昌衙门对城内民间团体密切监视，禁网甚严，革命党人的活动格外小心谨慎。新军里人数最多的秘密组织湖北军队同盟会，因为名称引人注目，改名群治学

1. 求幸福斋主：《民元报坛识小录》，载《越风》1936年2月第7期。

2. 刘望龄：《黑血·金鼓——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》，第216页。

社，对外声称“研究学问、提倡自治”，何海鸣在四十一标当兵时，就已参加了该社。到汉口《商务报》出版时，群治学社已发展成汉口革命党人机关，运动军队、准备起义是其主要任务。在此背景下，何海鸣、刘复基这两个湖南人，能够加入汉口党人圈子，亦是经过一番周密考察的。同人喻圭田回忆：

己酉（1909年）冬长至月，余卧病在室，闻人言，有二少年来自湖南，宿东门文毅祠，莫名何事，心窃异之……越日，（宛）思演来视余，曰今有二志士，皆湘产，久羁鄂，一姓刘字尧澄，一姓何字海鸣，闻我辈同志拟办报，特来接洽，将请住我店（按指宛思演开设的永顺布店），免招物议。余曰善。又越日，余病未愈，趋谒，时尧澄方与店友叉麻将，略事周旋，海鸣见余若旧相识，同床坐，抵掌谈天下，及至间岛、澳门交涉，为之愤慨慨叹者约十五分钟。

……别后谓思演曰：之二子者，悉非凡品，刘则意志深沉，何则齿牙锋利，都有咄咄逼人之慨。¹

刘复基是刘蛰庵的弟弟，湖南常德人，早年为湘西哥老会刑堂，曾追随宋教仁响应华兴会起义，事败一同东走日本。1906年投湖北新军，何海鸣当兵时，两人同在第四十一标，交往密切，引为挚友。刘后来因父亲病故退伍，回籍蛰居守制，这次被何海鸣邀来同操报业，本来出于同志间的勉励，未料这一友情之请，却断了这位老兄的性命。刘复基赴鄂时，正是严冬季节，与何海鸣相见甚欢，“着布袍，雪夜召何海鸣登蛇山脊，两足湿且冰，不解寒，（共商反清革命大计），指陈机要甚悉”，可见其一腔

1. 喻圭田：《大江报重出版祝词》，引自《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》，第307页。

热血，胸怀豪情。¹

宛思演、喻圭田眼力很准，他们发展的这两位同志，不愧为惊世骇俗之辈，后来一个成了湖北革命党首领，在武昌起义前夜不幸被捕，斩首于总督衙门外，为辛亥首义三烈士之一；一个因“大江报案”搅动全国舆论风潮，又在“二次革命”中单枪匹马，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这都是后话。

汉口《商务报》对湖北革命运动发生重大影响，享有“革命先锋”美誉，多赖刘复基的善于经营，与何海鸣的一枝健笔。武汉军学两界，会党众多，因该报的产生，联系更加紧密。刘复基为人沉稳，他花费很大气力，在新军中分销报纸，设立阅报处，赠送“义务报”，很受士兵信任；何海鸣写文章言辞锋利，抨击无所顾忌，“鄂中军士人手一纸，常在营中诵读”。他们都是湖北新军的老兵，熟悉各营连队情况，出入军营，已经十分便利，但刘复基感到革命同志中缺乏军人，担心一旦举事，缺乏响应，不久，又申请回到第四十一标当兵，以利于就近运动士兵。

何海鸣也负责为群治学社发展新社员，他的工作，在湘籍士兵居多的第四十一标里，做得最有成绩。这一标里，还有湘乡人杨王鹏担任第一营左队书记，他与左队队官潘康时交谊很好，本来，按群治学社的规定，新同志入社，以士兵为限，不得介绍官佐，但在1909年3月破格接纳了潘康时。“这一队，有队官与书记同志，便成了群治学社的核心力量。同营的前队，有社员何海鸣担任助理书记，也很便于发展。”²

到1910年春，湖南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，波及鄂省，湖北当局拟调兵入湘协助镇压，群治学社同人在汉口《商务报》集议，准备乘机起义，并把一批炸弹从汉口潜运到武昌，拟从四十一标发动。旋闻民变已平，乃

1. 李廉方：《辛亥武昌首义记》，湖北通志馆，1947年印；熊十力：《烈士刘尧澄传》，载《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》（中卷）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。

2. 黎东方：《细说民国创立》之四九《武昌起义》。

作罢。但士兵议论发难之事，走漏了风声，第八镇宣布戒严，派宪兵到标营内捉拿参加集会者，杨王鹏、潘康时等得到消息，翻墙逃走，因已暴露身份，只得避往日本。

这期间，又发生了《商务报》同人殴打湖南立宪派首领杨度一事。杨度公开支持清廷将川汉粤铁路“国有化”，对政府借款筑路一事，附和甚力，湖北的湘籍革命党人对其早就怀恨在心。听说杨度北上，于4月11日路过汉口，刘复基、李抱良、何海鸣等人计划予以惩治，具体办法是以欢迎乡贤名义，诱其到湖南会馆，再作发落。届时，三人前往杨度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下榻之处邀请，杨度见几个同乡神色反常，便一再谢绝赴会，“复基则扯其辫，拽出大门，英巡捕出面干涉，复基和杨度同被押入巡捕房”，“外闻尧澄吆喝殴打声不绝”。刘复基在巡捕房被拘留了八小时，才被释放。¹

新任湖广总督瑞澂是朝廷委派的川汉粤铁路会办，闻讯怒不可遏，勒令《商务报》停版，追查责任。结果，刘复基脱逃，李抱良遭重责开除军营，何海鸣未被杨度指认，暂时无事。瑞澂并不罢休，过了几天，又函请英国驻汉口领事，从租界中驱逐商务报馆，同时命令军警入室追查有关人员。风声鹤唳中，宛思演、詹大悲、何海鸣等见势不妙，有的逃跑，有的躲藏，顿时星散。何海鸣悄悄地乘船南行，去上海亲戚家避风头。

群治学社经此打击，停止了活动。当年秋天，易名为振武学社，才又活跃起来。从日本回来的杨王鹏当选社长后，为扩展组织，在各标、营、队增加“代表”一职，何海鸣是其中之一。几个月后，社员人数迅速增加，在黎元洪所辖的五标中，就有二百四十余人。不久，振武学社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部开会，黎元洪得到密告，将潘康时撤职，开革杨王鹏出营；

1. 据郭世佑：《文学社的实际领导人——刘复基》，载《常德县文史资料》第3辑，第27页，1987年；《刘复基与武昌起义的准备》，载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第9辑，第65页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。